

中国的小说艺术

周中明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8541
326

中国的小说艺术

周中明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的小说艺术

周中明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68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2.625 印张 插页 2 468 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 7-5435-1672-1/I·161 定价：8.20元

(桂)新登字05号

中国小说的历史经验值得重视

——周中明《中国的小说艺术》序

王利器

中国小说在群众中影响之大，是举世罕见的。《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尽管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诬蔑为“海盗”、“海淫”之作，屡遭禁毁，但它们却始终禁不绝，毁不掉，而在群众中葆有永久的艺术生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直至今天，我们还没有那一部小说在经久耐读、影响深远上能够胜过这些古典名著，或足以跟它们媲美的。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和瑰宝，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

由于中国长期受封建统治，小说是被排斥在文学正宗之外的，是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道”，“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君子弗为也”。^①因此，我国有丰富、完备的文论和诗话、词话，唯独对小说，除了有吉光片羽的叙跋和评点，却绝无系统的理论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小说的发展已粗具规模，出现了大量的“志怪”和“志人”小说，但齐梁时期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对各类文体的演变和发展，都列专篇作了论述，唯独把小说排斥在外，未列专篇，只在《谐隐》篇中提到一句：“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

说”。意谓“谐隐”的文体“不雅”，其地位，类似于“九流”之外的“小说”。轻视和排斥小说，这在我国是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诚如鲁迅所慨叹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②“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③我们可以为孔丘、庄周、屈原、杜甫、李白等诗文作家写出翔实的评传，而对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等小说家，却连他们的生卒年都难以断定，其生平事迹更无从查考。在封建社会，中国小说和小说家地位之低下，令人感到实在是很悲惨的。

近代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之后，梁启超等人虽然把小说推崇为“国民之魂”，抬高到吓人的地位，说：“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④断言：“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⑤但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利用小说作为他们宣传改良主义政治的工具，而对小说艺术本身的规律，却从未作过认真的研究。“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对小说的研究，确是比较认真的。不过这种认真也只是局限于“小说考证”，仍然谈不上对我国小说艺术的民族传统和发展规律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因此，对中国小说艺术作出认真的全面的科学的研究，这个任务就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新老研究者的肩上，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令人感到深为惋惜的是，在新中国创建之后的三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全国各条战线的一切工作，皆被纳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轨道。我们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也不例外，只注重于政治思想内容方面，而对艺术方面的研究则往往被忽视了。直至拨乱反正，批判和肃清极左的流毒之后，我们对中国小说的研究才纠正了这种重思想而轻艺术的偏向。我之所以对周中明同志

的《中国的小说艺术》感到特别可喜，正在于它是我国学术界纠正这种偏向之后，第一部专论中国小说艺术的著作。

从文艺界来说，现在世界上有两股潮流。一股是现代化的潮流，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已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就要求小说艺术的表现手法，也相应地要更加灵活多样和丰富多彩。在中国来说，也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各种有益的艺术表现技巧。另一股是“寻根”的思潮。特别是在西方，由于资本主义腐朽制度的种种弊端和危机，有许多人热衷于探究如何“回归东方”，也就是回归传统的道路。我看我们可以把这两股潮流汇合起来。学习西方现代文艺技巧，博取众长，不是为了接弃和取代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而是为了使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得到丰富和发展，使之既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的需要，又能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因此，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研究和发扬中国小说的民族传统，是非常重要的，切不可忽视的。

我们中国小说究竟有哪些艺术经验和民族传统，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认识。今天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作自由”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我们不仅有这个需要，而且有这个条件来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了。周中明的《中国的小说艺术》就是对此作出研究和探讨的重要成果之一。

周中明的这部著作，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我在这里不可能也不必一一加以介绍。我只想指出，它有三个特点：（一）耐人思索，富有学术性，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六部古典小说名著为代表，对中国小说的题材加工、形象塑造、语言艺术和风格特色等方面，作了比较具体深入的探讨。既有微观的透彻、细致的

分析，又有宏观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虽然不能说他的每个论点都是正确无误的，但是他所得出的每个结论，却都是经过研究，有相当充足的材料为根据的。它至少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能够发人深思，推动我们对中国小说的艺术传统和历史规律，作出更深入的探讨，得出更科学的认识。（二）古为今用，富有实用性。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论。它是紧紧围绕着小说创作，尤其是人物形象塑造这个中心，来总结和阐述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经验的。对于那些希望学习、研究中国小说的艺术经验，继承和发扬中国小说民族传统的作家、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本很有实用、参考价值的书。（三）雅俗共赏，富有可读性。这本书虽然是学术论著，但它很少有学究气。不仅可供专业人员参考，也完全适合于广大读者提高对古典小说的阅读和欣赏水平。由于这本书毕竟是论文汇集，它对于中国小说艺术经验的探讨和阐述，在全面性和系统性方面，还是有欠缺的。我已老矣，只有寄希望于作者和其它的研究者为此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了。

注：①班固：《汉书·艺文志》。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③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④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

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目 次

序..... 王利器(1)

第一编 题材加工

真实和伟大相结合

——论《水浒传》作者对原有题材的加工、提炼……(3)

极幻与极真相统一

——论《西游记》对《取经诗话》的继承和发展……(24)

第二编 人物塑造

虚实相生，精妙传神

——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塑造……(47)

要让人物性格闪出金子般的光彩

——论《水浒传》和《李逵负荆》对李逵形象的塑造……(63)

性格化、个性化是人物形象的核心和灵魂

- 论《水浒传》人物描写的特点……………(82)
- 论《水浒传》在典型形象塑造上的历史性突破……………(103)
- 应该怎样看待孙悟空……………(124)
- 论潘金莲的形象结构及其典型本质……………(143)
- 《红楼梦》人物描写的对称美……………(191)
- 不应把中国小说人物塑造的传统简单化、绝对化
- 关于《试论〈红楼梦〉对“传统写法”的打破》
的商榷……………(204)
- 曹雪芹在典型形象塑造上的新贡献……………(225)

第三编 语言艺术

- 《金瓶梅》对中国小说语言艺术的发展……………(251)
-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276)

第四编 风格特色

- 《西游记》艺术特色三题……………(299)
- 笑的艺术——《儒林外史》的显著特色……………(315)
- 卓越的悲剧艺术——黛玉之死……………(333)
- 论《红楼梦》中的象征手法……………(348)
- 论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371)
- 后记……………(395)

第一编 题材加工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鲁迅

真实和伟大相结合

——论《水浒传》作者对原有题材的加工、提炼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有时一味强调要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结果往往把英雄人物神化，搞成“假、大、空”；有时又一味强调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把人们搞得灰溜溜的。这两种倾向，反映了古今中外文学创作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诚如雨果所说的：“真实的暗疾是渺小，而伟大的暗疾则是虚伪。”^①正确的应该是：“同时达到伟大和真实，象莎士比亚一样，真实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②

真实和伟大的结合，我觉得这不仅是莎士比亚具有，也是《水浒传》等许多优秀作品共同的经验。下面我想从《水浒传》作者对原有题材的加工、提炼，看它是怎样成为一部真实和伟大相结合的杰作的。

—

将“乱自下生”改为“乱自上作”，描写出“逼上梁山”的典型社会环境，这是《水浒传》作者通过对原有题材的加工、提炼，达到真实和伟大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

《大宋宣和遗事》（以下简称《遗事》）中的梁山泊的故

事，被鲁迅称为“是《水浒传》之先声”，^③被郑振铎称为“最初的《水浒传》雏形”。^④其中写到三十六位英雄先后分做五批上梁山，究其造反的原因，不外乎都是属于“乱自下生”。请看：

第一批，杨志、李进义（即后来的卢俊义）、林冲、王雄（即后来的杨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人上山落草，是因为杨志杀了一个恶少后生而被刺配卫州，孙立、李进义等为救杨志而杀了防送军人。

第二批，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参加造反，是因为他们劫取了生辰纲，为逃避追捕，而“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

第三批，杜千、张岑、索超、董平，因“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落草”。

第四批，宋江杀惜，为逃避追捕，“只得带领朱同、雷横，并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泊上，寻那哥哥晁盖”。

第五批，呼延绰奉命“收捕宋江等，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因而带领李横“反叛朝廷，亦来投宋江为寇。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这三人来后，恰好是三十六人数足”。

从《遗事》所描写的这五批人上山造反的原因来看，都是属于个人的过失；从中我们很难看出阶级压迫、社会黑暗之类的本质问题。

《水浒传》作者在这个“雏形”的基础上，吸取其他有关水浒的传说、话本和戏曲等材料，对水浒英雄之所以上梁山参加造反的原因作了根本的改造和加工。

林冲，在《遗事》中仅有一个名字，而在《水浒传》中却有五回对他被逼上梁山的过程和思想性格的发展，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林冲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他安分守己，甚至逆来顺

受，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要参加造反。可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陷害忠良，却一步一步地把他非逼上梁山不可。

书中用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对林冲进行政治陷害、必欲置之于死地的高太尉高俅，此人在《遗事》等《水浒传》以前的任何有关水浒的材料中都从未提到过。《水浒传》作者写此人，似取材于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其中写道高俅仅仅因为会踢球，就成为端王的“亲信”。端王登上皇帝宝座后，便“优宠之”，加以提拔重用。这段情节跟《水浒传》作者的描写是一致的。但是《挥麈后录》只字没有提到高俅与林冲有何瓜葛，《水浒传》作者却把他写成是个迫害林冲的罪魁，并通过徽宗皇帝对这个泼皮无赖的赏识、重用，以及高俅的倚官仗势，利用职权陷害好人，给水浒英雄描绘了一个“逼上梁山”的典型社会环境。正如金圣叹所指出的：

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⑤

所谓“乱自上作”，“逼上梁山”，实际上反映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阶级斗争规律，说明被压迫阶级的犯上作乱，是由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造成的。尽管《水浒传》作者不可能是个阶级论者，但这在客观上却作出了符合阶级斗争规律的艺术加工。

《水浒传》作者不仅通过揭露高俅、蔡京、童贯、杨戩等人的恃强凌弱，作恶多端，通过描绘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等人的身世遭遇和性格发展，给我们描绘了“逼上梁山”的典型社会环境，而且在一系列具体情节上，也都揭示了社会政治的腐朽黑暗，是导致被压迫阶级乃至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走上

造反道路的根本原因。

杨志卖刀，《遗事》上说是“那杨志为等孙立不来，又值雪天，旅途贫困”所致。《水浒传》作者把它改写成是由于受到高俅的迫害，使杨志这个世代将门之子，由“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结果却被逼不得不靠出卖祖传宝刀，“好做盘缠，投往他处安身”。正如书中杨志所说的：“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刻薄！”作者接着还在一首诗中写道：

花石纲原没纪纲，奸邪到底困忠良。

早知廊庙当权重，不若山林聚义长。（第十二回）

由“雪天，旅途贫困”的自然原因，改造成为“奸邪到底困忠良”的社会政治原因，这显然更深刻地反映了“山林聚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本质。

杨志卖刀的地点，《遗事》写的是颍州。《水浒传》把它改为京城开封，并且写出被杨志杀死的恶少后生，“原来这人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在他跟杨志无理纠缠被杀后，群众皆称颂杨志“又与东京街上除了一害”。（第十二回）堂堂的京城，竟然连牛二这个泼皮都“治他不下”，可见那个社会吏治腐朽黑暗到了何等程度！杨志杀牛二，既然是为民除害，何罪之有！

晁盖等智取生辰纲，《遗事》上强调的是“劫”，《水浒传》作者突出的是“智取”，写他们在事前说誓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鉴察。”

（第十五回）参加智取生辰纲的白胜还唱了支山歌：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在阶级压迫、剥削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在北京害民”的梁中书，竟然榨取十万贯金珠宝贝与他丈人蔡太师祝寿，“诛求膏血庆生辰，不顾民生与死邻。”（第十六回）作者以“只因不义金珠去，致使群雄聚义来”，表明了晁盖等智取生辰纲的正义性和抗拒反动政府的追捕而投奔梁山的合理性。

董平上梁山，《遗事》上称是“为捕捉晁盖不获”。索超上梁山，《遗事》上称因“做了几项歹事勾当”。《水浒传》作者将他们改为在与梁山义军的作战中被俘，在宋江的感召下，他们参加义军，反戈一击。这样一改，便突出了梁山义军实行正确的俘虏政策，收到了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效果。

宋江杀惜，在《遗事》中是因为他看到她与吴伟两个“正在假倚”，便争风吃醋，把他俩都杀了。《水浒传》作者把它改写成是由于阎婆惜抓住了宋江私通梁山的信件，硬要到县衙门去告宋江，才迫使宋江不得不杀惜。这一改，就使宋江杀惜由男女三角关系之间的吃醋火拼，变为捍卫梁山起义事业和保全自己而不得不采取的自卫措施。尽管如此，《水浒传》中的宋江杀惜后，并未如《遗事》所描写的那样立即就上梁山，而是写出了宋江这样的官吏出身的人投身革命，必须经历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

呼延绰的走上“反叛朝廷”的道路，《遗事》上说他是由于“屡战屡败”和“朝廷督责严切”。《水浒传》写他是由于被义军俘虏。“僧人鲁智深反叛”，《遗事》是把他放在三十六人末尾，《水浒传》却把他放在最前头。《遗事》只说他是个“反

叛”到革命营垒中来的人物，而《水浒传》却把他描写成是个无私无畏的造反者，他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直教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第三回）金圣叹说他“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⑥一点不假，他碰见郑屠欺压金氏父女，就打死郑屠；他碰见周通要强娶民女，就打周通；他碰见崔道成、邱小乙欺压瓦官寺僧众，就和崔、邱两人相斗；他知道董超、薛霸要谋害林冲，就预先埋伏在野猪林进行救护。他在上梁山之前，早已在二龙山落草，“累次拒敌官军”。（第五十七回）经过《三山聚义打青州》，他才《众虎同心归水泊》的。（第五十八回）

上述事实说明，《遗事》所描写的五批英雄造反的原因，是为着个人卑下的、渺小的或偶然的故事，咎由自取，权且避难。而《水浒传》作者却把他们改造成为为着反抗剥削压迫这个崇高的、伟大的政治目的，它更深刻、更本质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逼上梁山”这句话之所以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也就在于此。

但是，《水浒传》作者在这方面的加工、改造，也并不都是很成功的。如卢俊义（在《遗事》中叫李进义）原来是跟杨志等一起第一批上山落草的十二人之一，在宋江上梁山之前，他早已做了梁山泊的副头领。《水浒传》作者把他改成在宋江等上山之后很久，才由宋江、吴用等用圈套硬把他拉上山，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加强争取招安的势力。卢俊义等人的被拉上梁山，跟前面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造成的“乱自上作”、“逼上梁山”相比，就显然既不够真实，也不够伟大，而露出作者故意杜撰的痕迹来了。